

美国地区法院
纽约南区

美利坚合众国,

-诉-

郭文贵,

被告.

阿娜丽莎-托雷斯, 地区法官: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

文档

电子归档 #: _____

归档日期: 06/24/2024

23 Cr. 118 (AT)

法庭令

被告郭提出动议, 请求法院重新考虑其2024年5月16日裁定的部分命令 (“命令”), 该命令部分批准了政府排除和限制郭专家证人证词的动议。被告动议, 电子卷宗第364号文件; 被告备忘录, 电子卷宗第365号文件; 参见命令, 电子卷宗第338号文件。基于以下理由:

1. 郭关于允许其估值专家雷蒙德-德拉贡就两种额外估值方法作证的动议被**驳回**;
2. 郭关于允许其中国共产党 (“中共”) 专家保罗-多兰作证的动议, 仅在以下方面被**批准**: (1) 中共对郭公开倡导的特定政治事业的反对; (2) 在纽约市发现的“秘密、非法的中国警察局”, 其他方面的动议被**驳回**;
3. 郭的会计专家托马斯-毕晓普可以仅作为总结证人, 就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赎回进行作证。

法律标准¹

《地方刑事规则》第49.1(d)条规定, 当事方可以在法院对原动议作出裁定后的十

¹ 命令描述了专家证词可采性的实质性法律标准, 见命令第 1-3 页。法院在此不再赘述。

四 (14) 天内提出“重新考虑的动议……。动议应附有一份简要说明律师认为法院遗漏的事项或控制性判决的备忘录。”

“重新考虑法院先前的命令是一种非常规的救济措施，应谨慎使用，以维护案件终结性和节约稀缺的司法资源。” *美国诉 Baldeo* 案，第13 Cr. 125号，2015 WL 252414, *1 (纽约南区法院，2015年1月20日)，经上诉确认，615 F. App'x 26 (第二巡回法院，2015年) (内部引述和引用省略)。“重新考虑动议‘不是重新审理旧问题、以新理论提出案件或以其他方式再试一次的工具。’” *美国诉 Lisi* 案，第15 Cr. 457号，2020 WL 1331955, *2 (纽约南区法院，2020年3月23日) (引用 *Analytical Surveys, Inc. 诉 Tonga Partners, L.P.* 案，684 F.3d 36, 52 (第二巡回法院，2012年) (已清理))。“批准此类动议的标准非常严格，除非动议方能够指出法院遗漏的控制性判决或数据——换句话说，可能合理预期改变法院结论的事项，否则重新考虑通常会被拒绝。” *美国诉 Goldberg* 案，第12 Cr. 864号，2021 WL 2444548, *1 (纽约南区法院，2021年6月15日) (引用省略)。

重新考虑的动议“只有在显示：(1) 控制性法律的干预性变化；(2) 新证据的获得；或 (3) 需要纠正明显错误或防止明显不公正”时才会被适当批准。” *同上* (引用省略)。

讨论

I. 雷蒙德·德拉贡

郭希望召集德拉贡作为估值专家，提出“基于2020年8月的可用信息，GTV的20亿美元估值是合理的”意见。德拉贡补充通知第3段，第3页，电子卷宗第322-1号文件。德拉贡通过分析Alvarez & Marsal公司（“A&M”）在2020年12月编制的估值报告（“A&M报告”），并使用三种不同的估值方法得出这一结论：（1）分析GTV的贴现现金流预测（“收益法”），（2）将十二家公司（“对比公司”）与GTV进行比较（“市场法”），以及（3）考虑在GTV私募期间实际募集的资本量（“反推法”）。同上，第2-3页。在命令中，法院允许德拉贡就反推法发表意见，但禁止其就A&M报告、收益法和市场法作证。命令第16-17页。郭现提出重新考虑动议，详细描述收益法和市场法及德拉贡的分析。²参见被告备忘录第3页与命令第17页的对比。

A. 收益法

收益法——也称为贴现现金流（“DCF”）方法——根据所有未来货币收益的现值对公司进行估值。参见，例如，关于*Young Broad. Co.* 案，430 B.R. 99, 126（纽约南区破产法院2010年）。应用收益法时，专家将贴现率乘以公司的未来现金流预测以得出估值。参见被告备忘录第7页；参照关于*Chemtura Corp.* 案，439 B.R. 561, 574（纽约南区破产法院2010年）。³“DCF分析结果可靠性的关键在于确定和计算：（1）要衡量的未来经济收益，以及（2）将该未来收益贴现为现值的贴现率。”关于*Med Diversified, Inc.* 案，346 B.R. 621, 632（纽约东区破产法院2006年）。

² 关于收益法和市场法的细节是由郭的律师提供的，而不是德拉贡。然而，由于法院已经允许德拉贡根据郭律师提供的解释，就反推法作证，命令第17页，法院将在确定德拉贡拟议证词在其他两种方法上的可靠性时，考虑郭的重新考虑简要。

³ 参见Jason Fernando与Khadija Khartit，《贴现现金流（DCF）解释及公式和示例》，Investopedia（2023年11月6日），<https://perma.cc/T66Y-9VJH>。

收益法在商业文献和判例法中广泛被接受。 *Lippe 诉 Bairnco Corp.*案, 288 B.R. 678, 689, 697 (纽约南区法院2003年), 经上诉确认, 99 F. App'x 274 (第二巡回法院2004年)。但是, 如果专家只是“使用DCF术语”并诉诸于收益法的公认可靠性, 而在DCF分析中做出“多个新颖的假设”, 那么其结论是不被接受的。 *Young*案, 430 B.R. 127; 参见 *Celebrity Cruises, Inc. 诉 Essef Corp.*案, 434 F. Supp. 2d 169, 179 (纽约南区法院2006年) (“任何分析都只与模型输入的质量一样好。”)。德拉贡的分析是否可靠只能通过详细审查其三步方法来确定。

1. 贴现率的计算

首先, “贴现率的适当计算对于从DCF方法中获得可靠的估值结果至关重要。” *Med Diversified* 案, 346 B.R. 635。德拉贡首先通过计算GTV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来计算GTV的贴现率, 即“通过承担债务或出售股权引入新资金的税后成本”。被告备忘录第9页; 参见Timothy A. Luehrman, 《价值几何? 总经理的估值指南》, 哈佛商业评论 (1997年5/6月), <https://perma.cc/J224-MZ5U> (“根据[DCF]方法, 企业的价值等于其预期未来现金流按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折现到现值的结果。”)。为了确定GTV的WACC, 德拉贡计算了股权和债务的成本。为了计算股权成本, 德拉贡通过取五家具有公开数据的对比公司的无杠杆贝塔值的中位数来估算GTV的贝塔值——一种用于近似风险的股票价格敏感性指标。被告备忘录第8-10页。然后, 德拉贡计算了股权和债务成本的加权平均值, 赋予股权成本100%的权重, 债务成本0%的权重, 因为GTV的“拟议资本结构全部为股权”, 最终得出9.3%的WACC。德拉贡补充通

知第9页。最后，他将WACC除以“早期公司成功率”来“调整新风险投资”，被告备忘录第7, 10页，最终得出37.2%的贴现率。同上，第12页。

德拉贡的贴现率计算存在两个主要缺陷。首先，德拉贡通过对比公司的贝塔值取平均值来得出GTV的贝塔估算值。被告备忘录第8-9页。虽然对可比上市公司的贝塔值取平均是估算私营公司贝塔值的一种公认方法，但专家必须选择适当的可比公司以确保贝塔计算的可靠性。⁴ 然而，德拉贡并未解释他选择这些对比公司的原因。见下文I.B节（更详细地描述对比公司存在的问题）。此外，他仅计算了五家对比公司的无杠杆贝塔值——而不是列出的全部十二家——且他未解释为什么这五家公司是估算GTV贝塔值的可靠子集。

其次，德拉贡在计算GTV的WACC时，未提供解释就将债务成本权重设为零——将其排除在WACC计算之外。“权重是由公司资本结构中的债务与股权比例决定的。”*Steiner Corp. 诉 Benninghoff* 案，5 F. Supp. 2d 1117, 1135（内华达州地区法院1998年）。尽管德拉贡表示他赋予股权成本100%的权重，因为“GTV的拟议资本结构全部为股权”，但他未引用任何来源支持这一假设。德拉贡补充通知第9页。此外，“是否应使用公司的实际债务与股权比例，或更接近行业平均水平的比例，通常是可以讨论的。”*Steiner Corp.* 案，5 F. Supp. 2d 1135；参见 *Young* 案，430 B.R. 127（发现所谓的DCF分析“仅考虑股权成本而不是债务和股权成本”采用了“新颖的假设”，这不是公认的

⁴ 参见Elvin Mirzayev与Charles Potters，《如何计算私营公司的贝塔值》，Investopedia（2021年12月31日），<https://perma.cc/S4YK-GS62>（“例如，苹果公司具有多样化的业务，包括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项目。该公司可能无法与仅有单一业务运营的私营公司（如智能手机生产）进行有效比较。”）。

DCF方法的一部分)。在没有解释德拉贡股权-债务分解的假设的情况下，他的权重分配是不可靠的。

德拉贡的贴现率计算——收益法的一个关键输入——依赖于虚构的贝塔值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的估算。他的推测性假设远远超出了交叉询问中可以探讨的小缺陷，成为排除证词的理由。参见 *Boucher 诉 美国铃木汽车公司案*，73 F.3d 18, 22 (第二巡回法院1996年) (“基于推测性假设的专家证词的采纳是滥用裁量权。”)。

2. 收入预测

收入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DCF模型的可靠性至关重要。参见 *关于 Genco Shipping & Trading Ltd. 案*，513 B.R. 233, 243 (纽约南区破产法院2014年) (“当管理层的预测不准确或不可靠时，DCF分析可能会有问题。”)；关于 *Adelphia Commc'ns Corp. 案*，512 B.R. 447, 471 (纽约南区破产法院2014年) (“从常识上讲，DCF在公司拥有准确的未来现金流预测时效果最佳 (可以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预测没有受到欺诈的影响，并且至少部分现金流为正时。”)。

在本案中，德拉贡并没有为GTV创建自己的收入预测，而是依赖于A&M生成的收入预测。这属于传闻证据。⁵郭辩称这仍然是可接受的，因为如果某个特定领域的专家在形成意见时会合理地依赖这些类型的事实或数据，那么专家可以考虑传闻材料。联邦证

⁵ 郭主张，德拉贡并未将预测作为事实依据，因为它们“潜在未来价值的意见”，而且“预测本质上不是事实。”被告备忘录第5页注3。郭的说法不正确。至少，德拉贡是将A&M的预测作为“A&M对GTV现金流的意见的真实性”提供的。参见 *Malletier 诉 Dooney & Bourke, Inc. 案*，525 F. Supp. 2d 558, 666 (纽约南区法院2007年)。而且，虽然这些预测是估算，德拉贡最终是将这些预测作为GTV未来现金流的真实估算来提供的。参见 *Smith 诉 Arizona 案*，第22-899号，602 U.S. __ (美国，2024年6月21日)，意见书第2页 (“当专家传达缺席分析师的声明以支持其意见时，如果这些声明只有在真实的情况下才能提供支持，那么这些声明作为证据进入是为了其真实性。”)。

据规则第703条；参见电子卷宗第328号文件第11-12页。但是，这一传闻规则的例外至少有两个理由不适用。

首先，根据“代言人”规则，“一方不能仅仅作为传声筒，通过宣称作证专家将传闻作为其证词的基础来传递传闻证据。”*Marvel Characters, Inc. 诉 Kirby* 案，726 F.3d 119, 136（第二巡回法院2013年）（引述省略；参照 *Malletier 诉 Dooney & Bourke, Inc.*案，525 F. Supp. 2d 558, 666（纽约南区法院2007年）。专家“不能仅仅重复另一位专家的意见”或“直接作证另一位专家的结论。”*U.S. Bank Nat'l Ass'n 诉 PHL Variable Life Ins. Co.* 案，112 F. Supp. 3d 122, 131（纽约南区法院2015年）。“专家证人最终必须提供自己的意见。”*Malletier* 案，525 F. Supp. 2d 664；参见 *Joint Stock Co. Channel One Russia Worldwide 诉 Infomir LLC*案，第16 Civ. 1318号，2021 WL 4810266, *21（纽约南区法院2021年9月30日）（“[专家的职责是提出（并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收集他人的观点。”）。例如，当预告专家在审判中无法出庭且法院授权替代专家时，新专家可以依赖原专家提供的“事实和数据”，但不能依赖“未经交叉询问的其他专家的意见。”*Jung 诉 Neschis* 案，第01 Civ. 6993号，2007 WL 5256966, *16（纽约南区法院2007年10月23日）（重点省略）；参见 *Palatkevich 诉 Choupak* 案，第12 Civ. 1681号，2014 WL 5463371, *1（纽约南区法院2014年10月22日）（裁定替代专家不能“简单重复”预告专家的分析，而必须“基于其在该主题领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本案中，A&M报告中的财务预测对德拉贡的估值意见至关重要。如果他简要地采纳A&M报告对其预测合理性的意见，这是不合适的。因为A&M报告的作者不会在审判

中接受交叉询问。⁶

其次，郭或德拉贡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A&M的收入预测是可靠的。“[专家可以依赖彼此的意见，但前提是每一步都满足可靠性的必要标准。如果一个专家的意见建立在另一个专家的基础上，那么后者的可靠性要求前者的可靠性。”*In re M/V MSC FLAMINIA* 案，第12 Civ. 8892号，2017 WL 3208598, *5（纽约南区法院2017年7月28日）。A&M在2020年8月没有GTV的收入预测，所以它使用了另一家公司GNews的模型，采用了相同的“用户增长和运营利润率”估计，同时假设GTV的用户基础数高于GNews。被告备忘录第5页。此外，GNews的预测是内部生成的，可能由涉及郭审判所涉欺诈计划的人员生成。参见电子卷宗第322号文件第7页；*Adelphia* 案，512 B.R. 463（拒绝应用DCF模型，因为预测不可靠或是欺诈的产物，因为模型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未来现金流的准确性）。因此，GNews的预测构成了GNews估值的不可靠基础。然后A&M将存疑的GNews预测转换为GTV预测——除了增加用户数量外没有其他改动——这是在解释或提供适当基础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重大分析步骤。A&M报告第2页，电子卷宗第366-3号文件；参见 *Boucher* 案，73 F.3d 21（指出当专家证词“基于不切实际和矛盾的假设”时应予以排除（已清理））。

针对德拉贡证词中“代言人”问题和可靠性问题，郭主张德拉贡通过将预测与对比公

⁶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当一个医生尽管不是放射学专家，却依赖X光诊断来得出治疗方案的结论时，可以依赖另一位专家的意见。*Dura Automotive Sys. of Ind., Inc.诉CTS Corp.* 案，285 F.3d 609, 613（第七巡回法院2002年）；参见《规则703的咨询委员会说明》（1972年）。但是，如果X光的可靠性是案件的关键问题，医生不能简单地“重复放射科医生的意见。”*Dura*案，285 F.3d 613。在这种情况下，实际评估X光的专家应该是“应该作证的人。”*同上*（引用*In re James Wilson Assocs.*案，965 F.2d 160, 172-73（第七巡回法院1992年））。

司的历史财务表现进行比较来验证GTV预测的可靠性。被告备忘录第5-6页。法院认为郭的验证理论不令人信服。在“代言人”问题上，德拉贡的验证并未改变他仍会将A&M的方法和计算结果呈现给陪审团，而不是他自己的。⁷ 这种验证无非是“仅仅为[A&M]的意见担保”，这是不允许的。*U.S. Bank* 案，112 F. Supp. 3d 131。关于可靠性，使用对比公司作为基准集是可疑的。⁸ 参见上文第I.A.1节；下文第I.B节。因此，支持德拉贡结论的财务预测是不可靠的。

3. 估值计算

郭承认，德拉贡没有进行“将[他的]折现率应用到 GTV 的收入预测中的计算”来得出GTV的估值范围。被告备忘录第11页。法院驳回了郭的论点，即估值计算是“机械的”且无需披露。虽然算术错误是“可以在交叉询问中适当攻击的小缺陷”，但只有在披露的情况下，政府才能探讨德拉贡的最终估值。*Amorgianos 诉 Nat'l R.R. Passenger Corp.* 案，303 F.3d 256, 267（第二巡回法院2002年）；参见命令第17页。

郭认为这一步骤是多余的，因为德拉贡的37.2%贴现率低于A&M报告使用的40%贴现率。被告备忘录第11页。因此，他断言，德拉贡的估值必然高于A&M报告得出的17亿美元估值。同上。郭的逻辑有两个缺陷。首先，它假设A&M报告是可靠的，而法院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见上文第I.A.2节。其次，它假设德拉贡可以将A&M报告的估值提交给陪审团。但根据规则703，德拉贡不能依赖——更不用说向陪审团披露——A&M报告对

⁷ 德拉贡并未独立计算GTV的财务预测。

⁸ 此外，郭表示，德拉贡计算的GTV复合年增长率（“CAGR”）“与对比公司的平均CAGR相差不大（244%对224%）。”被告备忘录第5页。这种不科学的结论没有任何统计显著性检验的支持。

GTV估值的意见。 *Jung* 案, 2007 WL 5256966, *16。 作证专家必须提供自己的估值意见, 而不是像德拉贡拟做的那样, 洗清另一个未接受交叉询问的专家的意见。⁹ 没有进行计算, 德拉贡就没有可提供的估值意见。

4. 结论

郭的欺诈指控部分取决于他在2020年8月宣称GTV价值20亿美元的声明。 估值专家的证词对于确定这一声明是否为虚假陈述是相关的。 法院也认识到“估值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Genco* 案, 513 B.R. 242。

但是, 联邦证据规则对专家证词采取的宽松态度不应与“让所有内容都进来”的哲学混淆。 *美国诉 DiDomenico* 案, 985 F.2d 1159, 1163 (第二巡回法院1993年) (引用 *Eymard 诉 Pan Am. World Airways* 案, 795 F.2d 1230, 1234 (第五巡回法院1986年))。 专家证词对陪审团来说可能“非常有力且相当具有误导性”, 法院有责任通过其“把关角色”确保“专家证词……基于可靠的基础。” *Daubert 诉 Merrell Dow Pharms., Inc.*案, 509 U.S. 579, 597 (1993年)。“为了保证可采性……关键是专家的分析在每一步都是可靠的。” *Amorgianos* 案, 303 F.3d 267。 虽然“专家推理中的小缺陷或对原本可靠方法的轻微修改不会使专家意见本身不可采纳”, 同上, 但在德拉贡的每一步中显著的缺陷、未经解释的假设和传闻“远远超出了可承受的程度”, 无法在交叉询问中有效探讨。 *Lippe* 案, 288 B.R. 701。 因此, 法院不会重新考虑其排除德拉贡拟议的收益法证词的决定。

B. 市场法

⁹ 德拉贡的拟议证词在A&M报告的有效性成为审判中的争议事实时可能是可采的。 然而, A&M报告的有效性与指控无关: 郭在2020年8月宣称GTV价值20亿美元之前并未看到在2020年12月制作的A&M报告。

市场法——也称为可比公司估值法——也是一种公认的估值方法。参见 *Celebrity Cruises* 诉 *Essef Corp.* 案, 434 F. Supp. 2d 169, 179 (纽约南区法院2006年) (引用 *Steiner Corp.* 案, 5 F. Supp. 2d 1124)。市场法“通过将公司与具有类似资产、运营和财务特征的其他上市公司进行比较来确定公司的价值。”关于 *Breitburn Energy Partners LP* 案, 582 B.R. 321, 330 (纽约南区破产法院2018年)。“使用一个或多个共同变量 (如收入、收益或现金流) 将价值标准化, 然后专家应用这些财务指标的倍数来得出市场对这些可比公司的估值。”*Chemtura* 案, 439 B.R. 575。

“这种分析的关键在于选择相对于被估公司适当的可比公司。”*Genco* 案, 513 B.R. 243。在本案中, 对比公司包括Meta、Snap、Twitter和腾讯——即世界上最最有价值和最知名的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之一。参见德拉贡补充通知第2页。德拉贡审查了对比公司的公开数据, 但他并未解释如何以及为何选择这个子集, 郭的辩护文件也未提供任何见解。参见被告备忘录第3-4页; 电子卷宗第328号文件第5-6页; 德拉贡补充通知。未能解释对比公司本身就是排除证词的理由。参见 *Lippe* 案, 288 B.R. 697 (“在进行可比公司分析时, 估值专家当然必须考虑可比公司的收益数据。公司越可比, 其数据越相关。如果可比公司与被估值公司之间存在差异, 应进行调整。”); *In re Cellular Info. Sys., Inc.* 案, 171 B.R. 926, 936 (纽约南区破产法院1994年) (无视专家的市场法分析, 因为他确定的可比公司“不仅大得多, 而且比被估公司更成熟”); 参见 *Manbro Energy Corp.* 诉 *Chatterjee Advisors, LLC* 案, 第20 Civ. 3773号, 2022 WL 4225543, *9 (纽约南区法院2022年9月13日) (允许专家就市场法作证, 只因“她解释了为何选择这些公司

作为可比公司”)。

法院从记录中可以推断的唯一解释是，对比公司正是A&M报告中使用的公司。对比A&M报告第8-19页与德拉贡补充通知第2页。这种对A&M子集的重复使用是德拉贡拟议证词的致命缺陷。参见 *Lippe 诉 Bairnco Corp.* 案，99 F. App'x 274, 279 (第二巡回法院2004年) (裁定依赖另一方提供的可比公司“未验证这些公司是否确实可比，且未调整他们的分析以考虑差异”是“远远超出‘小缺陷’”)。¹⁰

德拉贡的市场法意见也有缺陷，因为他再次未能根据市场法计算GTV的价值。相反，他假设公司每年都能实现财务预测，从而得出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的GTV股权价值。被告备忘录第13页。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他计算的每年股权价值都超过了A&M每年股权价值的计算值，因此他的估值范围必须超过A&M报告的14亿至26亿美元的估值范围。同上，第13-14页。再次说明，A&M报告不能提供给陪审团，因此德拉贡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¹¹ 他未能自行进行任何估值计算，却试图依赖A&M报告的合理性，这注定了他拟议的专家证词的失败。参见 *Delshah 60 Ninth, LLC 诉 Free People of PA LLC* 案，第20 Civ. 5905号，2024 WL 1120388, *10 (纽约南区法院2024年3月13日) (法院“必须无视[对另一专家意见的重复]”(已清理))。因此，法院认为德拉贡关于市场法的拟

¹⁰ A&M在其报告中解释其选择时称，这些公司“包括总部位于美国和中国的公司，这些公司专注于社交媒体、内容分发、通信和娱乐服务。”A&M报告第3页。这一宽泛的陈述没有提供必要的细节，使政府无法提出相反的证据或在交叉询问中适当探讨德拉贡或A&M对比公司选择的合理性。

¹¹ 即使A&M报告可以向陪审团提供，德拉贡的逻辑命题——他计算的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的股权价值超过A&M的计算值，因此导致更高的估值范围——也是站不住脚的。德拉贡计算的股权价值依赖于GTV的财务预测，而这些预测是不可靠的。见上文第I.A.2节。此外，A&M通过计算2021年、2022年、2023年和2024年的股权价值并使用这四年的加权平均值得出了其估值范围，其中2021年权重为10%，2024年权重为40%。见A&M报告第21页。德拉贡并未计算2024年的股权价值，也未说明在缺少这一年份的情况下应给每年赋予什么权重。他也未说明A&M所指定的权重是否正确。

议证词不可靠，必须被排除。¹²

II. 保罗·多兰

接下来，郭请求法院重新考虑其排除保罗·多兰关于中共预期专家证词部分内容的决定。被告备忘录第15-19页。法院先前裁定多兰拟议的几个主题“偏离太远，可能会将陪审团带入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命令第12页。在重新考虑时，郭认为法院应允许三个方面的证词：（1）关于中共集中镇压和监控活动的“五毒”的证词，（2）关于中共在海外使用秘密警察局的证词，以及（3）关于中共利用当地国民作为“影响力代理人”的方法的证词。被告备忘录第15页。

首先，郭主张，多兰关于“五毒”——民主信仰、宗教人物、台湾独立、西藏独立和维吾尔独立的拟议证词对“美国陪审团理解像郭这样的人为什么即使在美国也会害怕中共的影响至关重要。”同上，第16页。只要郭倡导过民主和维吾尔独立，见同上，第16-17页，多兰可以作证中共反对郭的公开立场。然而，关于郭未公开支持的其他事业的偏离在《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下是无关的。

其次，郭认为，应允许多兰就“秘密、非法的中国警察局”作证，这将“佐证[郭]在美国的监视和渗透恐惧。”同上，第17页。多兰可以就“在纽约市发现的一个警察局”作证，这可能会稍微影响到郭的心态。多兰补充通知第3段，第5页，电子卷宗第322-3号文件；见电子卷宗第322号文件第22页。关于“在至少38个国家的47个此类警察局”的更广泛证词，电子卷宗第322-3号文件第3段，第5页，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仍然是无关的，

¹² 出于谨慎考虑，法院已经审查了郭关于德拉贡证词可采性的论点，而不考虑严格的重新考虑动议标准。即使在这一标准下审查，这些证词也明显不符合要求。

并且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03条是不必要的重复证据。¹³

第三，郭认为应允许多兰作证“中共积极招募当地国民监视和渗透其公认的敌人。”被告备忘录第19页。他认为这项证词支持了他“相信这些代理人渗透了他的反中共组织”的观点。¹⁴ 同上。然而，根据多兰的补充披露，他打算具体作证中共指示其招募的“当地国民……申请地方、州和联邦机构的职位。”电子卷宗第322-3号文件第5段，第7(j)页。此证词与中共是否指示“影响力代理人”渗透郭的组织无关。此外，法院再次认为，此证词存在“混淆问题”和“误导陪审团”的重大风险，暗示本案涉及的政府雇员可能被中共控制。命令第12页；《联邦证据规则》第403条。此证词也属于不必要的重复证据。

因此，郭关于允许多兰作证的动议在以下范围内被批准：多兰可以就（1）中共反对郭公开倡导的特定政治事业；以及（2）在纽约市发现的“秘密、非法的中国警察局”作证。除此之外，动议被驳回。

III. 托马斯·毕晓普

最后，郭表示，他仍打算召集托马斯·毕晓普——他提出的会计专家——作为专家证人，就“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赎回活动”作证。¹⁵ 被告备忘录第1页注1。郭主张，政府最初的动议中“没有寻求排除”这项证词。同上。政府则认为，他们已动议排除毕晓普的所

¹³ 多兰被允许就中共针对像郭这样的海外华人的行动作证，这可能为郭对被指控行为的无罪解释提供支持。参见电子卷宗第243号文件第6-7页。而且，双方已经协商并引入了一项协议，详细描述了中共诋毁、骚扰和遣返郭的努力。例如，审判记录第402:9-405:11（引用DX协议0001）。《联邦证据规则》第403条赋予地区法院“广泛的裁量权，即使相关证据也可以排除……如果它会造成本不必要的重复”，法院认为本案即是如此。美国诉Miller案，626 F.3d 682, 689-90（第二巡回法院2010年）（引号和引文省略）。

¹⁴ 郭声称政府“并未寻求排除多兰在该主题上的全部证词。”被告备忘录第18页。事实并非如此：政府在其列出的“无关但详细的题外话”中专门提到了这个主题。电子卷宗第322号文件第23-24页。

¹⁵ “赎回”是一种金融交易，其中个人将购买的证券赎回为一笔资金。参见James Chen，《赎回：金融和商业中的定义》，Investopedia（2022年5月5日），<https://perma.cc/DH6H-7KKX>。

有专家证词，并且“法院完全批准了该请求。”政府备忘录第6页注5，电子卷宗第373号文件。因此，政府要求法院“严格限制毕晓普的非专家证词”——例如，他预计就证据中的银行记录作总结性证词。*同上*。

根据他的初步披露，毕晓普打算作证称“喜马拉雅交易所通过其在FV银行的账户支付了超过五千万美元的客户赎回款项。”电子卷宗第327-6号文件第3页。他通过“分析FV银行记录中某些被归类为‘赎回’的支付”得出了这一结论。*同上*，第4页。“为了确认记录准确反映了赎回活动，”毕晓普“分析了FV银行提供的其他银行数据，并将其与喜马拉雅交易所账户的银行对账单进行了比较。”*同上*。“毕晓普团队的成员”随后检查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赎回交易样本”，并“验证这些样本与喜马拉雅交易所数据库中的客户账户准确对应。”*同上*。

尽管命令未明确涉及该主题，¹⁶ 但法院认为，毕晓普关于喜马拉雅交易所赎回的证词——如同他其他拟议的专家证词——“并非超出普通陪审员的知识范围。”命令第15页。进行支付分类为“赎回”的算术加法不需要专业知识。参见 *Schwartz 诉 Fortune Mag.* 案，193 F.R.D. 144, 147（纽约南区法院2000年）（认为涉及“基本计算”的证词不涉及任何专业知识，并根据规则702适当排除）。毕晓普确认银行记录准确性的努力也不涉及任何技术专长：他（和他团队的成员）只是将记录与银行对账单和喜马拉雅交易所客户账户进行了交叉核对。法院再次认为，这种基本的匹配交易方法——“源自日常生活中的推理过

¹⁶ 根据2024年4月24日的法院命令，法院发现郭的初步披露不足，并命令他“提供‘所有意见的完整陈述’及‘其依据和理由’。”电子卷宗第305号文件第5页（引用《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b)(1)(C)(iii)条）。郭随后提交的补充披露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喜马拉雅交易所赎回的预期证词，电子卷宗第322-4号文件第2-3页，双方在第二轮简报中也没有讨论这个话题，电子卷宗第322号文件和第328号文件。因此，法院理解毕晓普将其证词缩减为补充披露中讨论的“四个狭窄意见”。电子卷宗第328号文件第36页。

程”——不构成专家证词。美国诉 Cuti 案, 720 F.3d 453, 459 (第二巡回法院2013年)

(已清理); 见命令第15页注8 (引用 美国诉 Lebedev 案, 932 F.3d 40, 50 (第二巡回法院2019年))。因此, 毕晓普不得作为专家就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赎回作证。

然而, 政府承认, 郭“可以召集毕晓普作为总结证人, 概述已经作为证据的某些银行记录。”政府备忘录第6页注5 (引用被告备忘录第1页注1)。只要毕晓普赎回相关证词的基础记录可采, 毕晓普可以作为非专家总结证人, 就其分析结果作证。参见 美国诉 Blakstad 案, 第19 Cr. 486号, 2021 WL 5233417, *5 (纽约南区法院2021年11月9日) (允许证人作为总结证人就“资金流入和流出[被告的]账户”作证)。

结论

基于上述原因, 郭的重新考虑动议部分批准, 部分驳回。请法院书记员终止电子卷宗第364号文件的动议。

特此下令

日期: 2024年6月24日

纽约州, 纽约市



阿娜丽莎-托雷斯
美国地区法官